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笔译研究：学科的诞生、成长与成熟

韩子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

© 2019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原名《中国外语教育》) (1), 20-26 页

提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笔译研究经历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了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全过程。

本文阐述其中三方面的突出成就、三个特别值得坚持的主要经验和需要注意的几点不足。

关键词： 改革开放；笔译研究；学科成长；发展阶段

1. 引言

及时总结、梳理以往研究一直是翻译学界的优良传统。20世纪90年代初，Bassnett & Lefevere (1992: vii) 宣称“翻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成长起来，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成功故事”，这是对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总结。一些著作和工具书，如《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Gentzler 1993)、《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nell-Hornby 2006)等，更是西方总结其翻译研究成就的具体成果。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也不断总结翻译研究的成果，曾经有学者每年都会梳理上一年的翻译研究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还推出了专门的著作(许钧、穆雷 2009a)，当时还有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后30年间国内翻译研究的情况(许钧、穆雷 2009b)。这一传统对于认识过去、推动学科发展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也应进行这样的总结。

理论上，只需在30年回顾的基础上，重点总结最近10年的情况即可。但考虑到口译研究发展迅猛，有些学者甚至已经将其看作单独的学科(如Pöchhacker 2004: 31)，而近些年笔译研究加速成长，成果众多，有必要对笔译研究和口译研究分别进行总结。此前的各种回顾总结，或按

照发展特点展开(如郭建中 1999a)，或按照年度或大事件展开(如许钧、穆雷 2009a)，对时间段的划分比较粗线条，未能充分展示国内翻译研究的时间脉络。因此，笔者参照《翻译研究的多重转向》的做法，根据实际情况，大致以10年为单位，对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这40年里从诞生到成长、成熟的过程作一番梳理。

2. 恢复与整理期

恢复与整理期大致开始于1978年，结束于1987年。笔译研究重新启动，经验总结和反思不断出现，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梳理掀起高潮，西方翻译理论开始为学者所关注，翻译研究逐渐制度化。笔译研究作为学科，开始萌芽。

大量探讨翻译经验的学术论文在这一时期发表。最能代表笔译研究成果的是1984年出版的一本专著和三部论文集。专著是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翻译通史，梳理了五四运动之前我国历史上主要的翻译活动。与此前的翻译史著作，如1960年出版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相比，该书考察的时间更长，考察的翻译活动更加多样，考察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在翻译研究刚刚恢复的年代，该书不仅帮助翻译界人士形成完整的中国翻译史观，还让学者们对翻译研究应该关注什么有了较统一的认识。

三部论文集是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翻译协会”)、《翻译通讯》(现《中国翻译》)编辑部编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翻译论集》收录了从汉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共180余篇有关翻译的论述,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是广泛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译论,其中许多译论的原文,至今也不易找到;二是编者自己的理论意识很强,明确提出“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是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罗新璋1984:19)。两部《翻译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894年至1983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翻译论文。虽然这些论文发表的年代并不久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多数论文也不易找到。一些在1949年前发表的期刊论文至今也难以在其他地方找到。

还有一部特殊的论文集体现了当时国内学者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努力,即1983年出版的《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该论文集虽只收录了14篇文章,且篇幅都不太长,但涵盖的内容丰富,既介绍了多位当代欧美理论家的翻译思想,也介绍了苏联学者的翻译思想;既介绍了当代学者的翻译思想,也评介了如泰特勒(A. T. Tytler)这样的古代学者的思想。介绍的翻译思想既有文学翻译方面的,也有《圣经》翻译方面的。虽然论文集主要局限于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对当时西方影响更大的文化学派理论完全没有涉及,但足以说明学界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1979年《翻译通讯》创刊,1982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1986年《上海科技翻译》创刊。这几件大事标志着国内的笔译研究进入了制度化阶段。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不仅是翻译行业组织,也是翻译学术组织,成立之初就吸引大批翻译学者加入,许多入会的翻译家同时积极从事翻译研究。之后,协会设《翻译通讯》为会刊,并组织多项翻译学术活动。这两本期刊的创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专门的发表园地,推动了大批翻译研究人才的培养。有了固定的期刊,研究就有了制度化保障。

3. 对外借鉴活跃期

对外借鉴活跃期大约始于1987年,基本结束

于1996年。这一时期的翻译经验总结更加深入,研究的理论性明显增强,借鉴国外翻译理论成为一时热潮,为笔译研究学科化奠定了基础。

虽然翻译经验总结仍然是主流,但总结得更加深入,更有理论性,涌现出各类翻译教材。有学者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翻译教材(绝大多数是笔译教材)，“多以‘教程’、‘技巧’、‘手册’为名,极少见到过去那种经验式、漫谈式、初探式的书名”(张美芳2001:12),说明此时的教材编写者,已不仅只总结自己的翻译经验,还考察他人的翻译,归纳更为系统。与以往笔译教材主要关注文学翻译明显不同,当时还出现了针对专门领域的翻译教材,特别是商贸和科技领域的翻译教材,且理论成分明显增加;许多翻译教材都引述翻译理论家的一些观点,比如《英汉翻译概要》在介绍翻译的定义时就引用了奈达(Eugene A. Nida)1965年专著中提出的观点(靳梅琳1995:1-2)。

本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翻译理论研究著作,研究的理论性空前增强,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翻译原理》。在《自序》中,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只是到了现代语言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开始逐步建立真正的文学翻译理论。”(张今1987:7)与之前的文学翻译研究明显不同,该书作者旨在建立一套文学翻译的理论体系,许多章节的标题都包含“思想性”“真实性”这样的字眼,且广泛引用国外的翻译理论,包括奈达的理论等,理论导向明显。作者还广泛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不过,广泛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特别是当代翻译理论,才是本时期笔译研究的主要特点。除了教材和理论专著广泛引用西方翻译理论之外,专门介绍西方理论的论文和专著也频频出现。专门评介西方翻译理论(主要是奈达翻译理论)的论文在主要外语和翻译类期刊上不断发表。奈达是该时期翻译论文中最常提到的人名。1984年《奈达论翻译》就已出版,并在翻译界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新编奈达论翻译》又出版了,一时间,奈达成了翻译理论的代名词,国内翻译研究界也经历了从“言必称奈达”到“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

陷”(杨晓荣 1996: 8)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其他国外翻译理论也纷纷被译介到国内。对国外理论借鉴的另一个重大成果是《西方翻译简史》。这部书名虽然为翻译简史,其实理论的内容更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翻译理论史。

4. 学科意识觉醒期

本时期大致开始于1995年,结束于2003年,突出特点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受到空前关注。翻译学理应是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这个观念逐渐为人接受,标志着笔译研究学科的建立¹。

有关建立翻译学的讨论早就开始了。1951年,董秋斯就提出要写一部大书,名为“中国翻译学”(董秋斯 1984: 543)。但此后很多年里,这一话题很少有人提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谭载喜等学者纷纷撰文,对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深入的论证,并提出多个略有不同的翻译学框架。1995年争论达到高潮,张南峰的论文《走出死胡同 建立翻译学》在《外国语》发表,很快引起学界关注。同年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将“翻译学”作为学科来讨论的专著。之后讨论翻译学的著述越来越多,其中谭载喜于2000年出版的《翻译学》一书影响尤其大。

围绕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还有一场论战。有学者大力推动建立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明确表示反对,双方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辩论。2000年,《外语与外语教学》专门组织双方进行了论战。从后来的相关讨论来看,支持建立翻译学一方的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此后,“翻译学”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翻译研究的统称,都被广泛接受。另外,虽然论战中支持方经常援引西方翻译学科的发展作为证据,但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这场学科大讨论有着中西互鉴的视角,但并非是按照西方学者提出的框架进行的,中国学者的观点主张、思维方式和理论来源迥异于西方学者,属于我们自

己对翻译学学科理论的构建”(蓝红军 2018: 8)。

几乎同时进行的另一场论战也有力地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建立。大约从1997年开始,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另外一些学者则针锋相对,认为建立中国翻译学没有必要也无可能。有人把这两派称为“中国特色派”和“普遍理论派”(鲁伟、李德凤 2010: 11)。从当时的情况看,后者似乎取得了胜利,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该论战在21世纪初也逐渐平息。在一个问题上两派是有共识的,那就是翻译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双方辩论再激烈,在这一点上从来没有分歧。

翻译研究学科意识的觉醒在现实层面也得到了实现。2003年,国家批准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翻译学二级学科。学者的学科意识在教学制度上得到了呼应。

5. 研究深入与拓展期

这一时期大致开始于2003年,到2009年基本告一段落。期间哲学思潮兴起,研究领域快速拓展,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发展,笔译研究学科快速成长。

哲学思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有关翻译主体性的探讨。主体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讨论,主要关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哲学意味不强,也很少参考哲学思想。2003年,《中国翻译》第1期集中推出了三篇探讨翻译主体性的论文,都提及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明显参照了当代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同年第3期及第二年,《中国翻译》又刊发了几篇文章,就翻译中的主体性加以分析。自此以后,主体性一直是国内翻译界比较关注的话题。

哲学思潮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解构主义思想的普遍关注,并由此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审视,推动翻译观念的更新。1999年郭建中发表《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介绍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特(Roland Barthes)的翻译思想,虽然介绍很全面,当时却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学界大规模关

¹ 学者们所说的翻译研究,通常其实也就是笔译研究,因为口译研究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且最近明显有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趋势。为了论述方便,除非特别之处,本文将笔译研究等同于翻译研究。

注解构主义是在2000年之后,讨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论文开始增多。许多翻译学者的论文和著作中频频提及德里达,其中吕俊和蔡新乐的多篇论文影响尤其大。还有学者用解构主义思想来分析传统的翻译思想(王东风2004)。《解构主义与翻译》(*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一书也于2004年引进国内。

哲学思潮第三个表现就是哲学界开始集中关注翻译研究,并出版了有分量的专著。国内关注翻译问题的哲学家并不少,但出版专著讨论翻译问题的,此前却没有。本时期,有两位哲学家出版了专著,或从某一哲学视角讨论翻译问题(李河2005),或以哲学家的视角对翻译问题作较为整体性的考察(单继刚2007)。两部著作探讨的内容和视角虽然和翻译学界不完全一致,其着眼点也不是要解决翻译研究问题,但客观上从另外的角度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思考,当然也可以看作是翻译研究。

研究领域的拓展主要表现为应用翻译研究和中译外研究的兴起。2003年起,有关应用翻译研究的讨论日益增多(如方梦之2003等),随后两年两部应用翻译教程出版(方梦之、毛忠明2005;贾文波2004)。具体应用领域翻译的研究,如经贸翻译研究、法律翻译研究等也迅速发展起来。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翻译》刊登的有关新闻翻译、财经翻译、政论翻译研究的论文开始增多。2003年起,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并已形成制度。中译外此前也一直有学者关注,但没有形成气候。进入本时期,研究成果明显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翻译》刊登的论文来看,仅就文学翻译研究而言,2005年中译外研究的论文数量首次超过外译中研究的论文,之后几年有所反复。2009年之后,中译外研究一直大幅领先外译中研究。¹全国中译外研讨会自2002年起也每两年召开一次。

6. 理论与对象创新期

理论与对象创新期始于2009年,持续到现在,实际是上一时期的延续,研究深度和广度持

续加深,但哲学性的研究明显减少,原创性理论集中涌现,文学文化外译成为研究热点,翻译教学研究异军突起,研究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瞩目,笔译研究作为学科已经成熟。

本时期原创性的本土理论纷纷涌现。最早出现且形成广泛影响的是生态翻译理论。通过胡庚申和许建忠等学者的努力,生态翻译学很快就赢得众多学者的响应,涌现出数量可观的专著(如岳中生2018)及论文。西方学者虽也积极关注翻译与生态的问题(Cronin 2017),却比国内学者晚得多,且无法断定西方学者是否受国内学者的启发。其他原创翻译理论还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

还有许多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的理论或概念加以修订甚至扩充,提出新的概念或是拓展应用的范围。比如,西方翻译学界自20世纪的“文化转向”之后,出现了多种“转向”说,如“权力转向”“小说转向”等。国内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转向”,如“社会心理学转向”、为西方学者广泛接受的“语用转向”等。语料库翻译学也是如此。虽然学界一般认为,语料库和翻译研究结合始于英国的莫娜·贝克(Mona Baker),西方的语料库翻译研究一直发展很快,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究者大多也会提到西方学者;但不可否认,国内的语料库翻译研究在应用广度上已经超过西方,不仅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还广泛应用于政治文本翻译、科技文本翻译等领域。同时,研究深度也有所加强,不仅有译者风格研究,还推出意识形态研究,提出语料库批评译学(胡开宝、李晓倩2015)。

文学文化外译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外译研究,包括有关当代中国文学外语译文、中国文学外译译者、中国文学外译策略与政策的研究。2007年《大中华文库》引发了第一波文学外译研究热潮。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更强烈的第二波热潮。中国文学外语译本,特别是英译本成了学者研究的焦点。

¹ 基于笔者对1987年至2016年间《中国翻译》刊载的外译中论文和中译外论文的统计分析。参见Han, Ziman. forthcoming. The literary obsess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study based 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and *Babel* [A]. In Han Ziman & Li Defeng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State of the Art* [C]. New York: Springer.

中国文学外译译者，尤其是葛浩文等海外汉学家迅速成为翻译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有关中国文学外译策略与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译者选择、传播模式等问题展开，并进行了多场争论。二是典籍外译研究，同样围绕典籍的外语译文、外译译者以及外译策略与政策等展开研究。研究对象最初主要是文学典籍，特别是四大名著以及古典诗歌和戏剧，后来逐渐扩展到哲学典籍和科技典籍的翻译。三是政治、法律、旅游等当代非文学文本的外译研究。当代政治文本的外译研究主要围绕中央文献的外译展开，如政府工作报告等的翻译，天津外国语大学还设立了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博士点，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政治文本的外译。

翻译教学在20世纪就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出版专著(穆雷 1999)，还有学者在21世纪初出版专门研究英汉翻译教材的著作(张美芳 2001)，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本时期，翻译教学研究更加活跃，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2009年至2018年的大多年份里，《中国翻译》刊登的翻译教学方面的论文都超过总发文量的十分之一，有的年份中甚至达到五分之一。专著的数量更是大幅度增长，以“翻译教学”及“翻译教材”为书名关键词，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里分别能检索到82部和15部，绝大部分都是2010年以后出版的。以翻译教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增长也很快。翻译教学研究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成果数量的增长上，还体现在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上。翻译教学研究开始重视教学理论(如陈亚红、檀锐 2016；陶友兰 2013)；研究的内容也拓展到专门领域的翻译教学，如科技翻译教学研究等(如吴鸿志 2017)。

本时期国内外翻译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在国外期刊，包括西方主流翻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国外出版的翻译学术著作也越来越多，许多还在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交流的也越来越多，对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越来越熟悉，以往国内翻译研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况逐渐被打破。我们不仅做到同步了解西方翻译

界同行的研究，自己的研究也能够很快为西方同行所熟知。国内的翻译研究在国际上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早在2013年，西方有学者在提到翻译理论的发展时就注意到，“中国学者在过去10年里用英语发表了大量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推动翻译理论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Williams 2013: 4)。

7. 成就、经验与不足

40年里中国的笔译研究变化巨大，称得上是中国版的“成功故事”，成就有目共睹，经验值得回味，但教训也需要警醒。

值得注意的成就有三项。一是推动学科的发展，催生翻译学这一学科，又推动其成长直至成熟。翻译学科最初是文学、语言学研究之下的从属学科，如今与二者并驾齐驱，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的五大研究方向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翻译研究自身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翻译研究学者自己作了扎实的研究。从横向来看，虽然中国的翻译学科建设比西方起步要晚，但成长的速度超过了西方。20世纪末有学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许钧 1996: 3)。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差不多追回了这20年，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小了。二是形成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特色”翻译学赋予了新的含义。虽然中国的笔译研究一直积极学习西方，但自主创新历来也是中国翻译学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且越到后期成绩越突出，最后一个时期在理论和研究对象上的创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是促进国内的翻译教学与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教学的推动，又会反哺翻译教学。国内的翻译教学，无论是授课模式，还是教材的编写，许多都受益于翻译学研究。有的直接在教材中引入理论的内容，有的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贯彻到了教材中(如孙致礼 2003)。还有更多的教材和教学，都受翻译教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如穆雷(1999)、张美芳(2001)、陶友兰(2013)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取得这样的成就，至少有三条经验值得我们

坚持下去。第一，密切关注实践。早期的翻译实践总结和后期研究对象的拓展，都反映了研究者对翻译实践的强烈关注；学科意识的觉醒和翻译教学研究的兴起则有翻译教学实践驱动因素的影响。即便是主要为理论探讨的西方理论评介和哲学性翻译探讨，大多也都结合中国的笔译实例来进行。重大的研究突破，更是直接来自对翻译实践的关注，如文学文化外译研究就是因为学者们关注文学文化外译实践而兴起的。这种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西方学者的少量研究(如 Campbell 1998; Pokorn 2005)。第二，紧密联系行业，与翻译行业保持良好互动。早期的翻译研究者进行的大多是文学翻译研究。研究者积极联系文学译者，发掘整理他们的翻译思想。应用翻译研究兴起后，与相关行业联系更为密切。学界与行业的联系中，中国翻译协会的作用尤其突出。第三，借鉴他人成果，博采众长。中国的翻译研究一方面不断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使得我们的研究不仅不再明显落后于西方，还有了自己的独到之处，显示出特色。

当然，我们的笔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发展中应作为教训加以警醒。最突出的一点是，对于翻译研究的认识还不够准确，主要表现为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的区别不清楚，过分追求理论创新，对于纷繁复杂的翻译现象却视而不见，部分学者对翻译的认知甚至远远落后于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业。笔者曾将这种对理论创新的迷信称为“理论创新的焦虑”(韩子满 2015: 13)。此种现象，在前几年层出不穷的各种“转向”中表现最为明显。这种只迷信理论创新，却忽视新翻译现象的学者不在少数。2015年，多位学者疾呼要“重新定位”翻译，这绝不是空穴来风。另一个不足与此相关，即过于关注文学翻译，对非文学翻译关注不足。虽然40年来文学翻译研究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但非文学翻译研究整体上仍然比较薄弱，众多的学者仍然挤在文学翻译研究这架独木桥上。还有一个不足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总结、梳理乃至阐发还不够。继恢复与整理期出版的几本论文集之后，王宏印(2003)和张

佩瑶(2010)等学者又分别出版专著或编著，对传统翻译理论进行阐发和翻译，但与评介西方理论和提出新理论相比，这方面的成果还太少。

8. 结语

相对于我国悠久的翻译史和翻译研究史，40年虽只不过弹指一瞬间，但却是中国笔译研究成长最为迅速的40年。篇幅所限，以上梳理挂一漏万，也只能对主要的成果和思想进行粗线条的分析，勾勒出笔译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从诞生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一些学者及其成果难免有所遗漏，这绝不是轻视，而是本文重点在于描述发展过程，对于个人的贡献无暇顾及。我们深信，只要能保持目前的势头，坚持上文提及的经验，同时克服不足，我国的笔译研究必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成为外语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 Bassnett, S. & A. Lefevere. 1992.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A]. In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vii-viii.
- Campbell, S. 1998. *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 Cronin, M. 2017.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Anthropocene* [M]. London: Routledge.
-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Routledge.
- Pöschhacker, F. 2004.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 Pokorn, N. K. 2005.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Translation into a Non-mother Tongu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nell-Hornby, M. 2006.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Williams, J. 2013.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陈亚红、檀锐, 2016, 《当代英语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探析》[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 董秋斯, 1984,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 [A]. 载罗新璋

- (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i-ii, 536-544。
- 方梦之, 2003, 我国的应用翻译: 定位与学术研究——2003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侧记[J],《中国翻译》(6): 47-49。
- 方梦之、毛忠明(编), 2005,《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郭建中, 1999a, 中国翻译界十年(1987—1997): 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6): 53-60。
- 郭建中, 1999b, 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J],《上海科技翻译》(4): 4-9。
- 韩子满, 2015, 转向冲动与问题意识——也谈当前国内的翻译研究[J],《上海翻译》(3): 10-16。
- 胡开宝、李晓倩, 2015, 语料库批评译学: 内涵与意义[J],《中国外语》(1): 90-100。
- 贾文波, 2004,《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靳梅琳, 1995,《英汉翻译概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 蓝红军, 2018,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 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87—2017)[J],《中国翻译》(1): 7-16。
- 李河, 2005,《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 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鲁伟、李德凤, 2010, 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误区还是必然?——兼评《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2): 11-14。
- 罗新璋, 1984,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i-ii, 1-19。
- 马祖毅, 1984,《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穆雷(编), 1999,《中国翻译教学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单继刚, 2007,《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孙致礼(编), 2003,《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陶友兰, 2013,《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 理论构建与对策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东风, 2004, 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J],《中国翻译》(6): 3-9。
- 王宏印, 2003,《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吴鸿志, 2017,《科技英语翻译与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钧, 1996, 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与R.阿埃瑟朗教授谈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1): 2-8。
- 许钧、穆雷(编), 2009a,《中国翻译研究(1949—2009)》[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许钧、穆雷, 2009b, 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J],《外国语》(1): 77-87。
- 杨晓荣, 1996, 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J],《中国翻译》(6): 8-11。
- 岳中生, 2018,《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 张今, 1987,《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张美芳, 2001,《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张佩瑶(编), 2010,《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 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 1983,《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1984a,《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1984b,《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简介

韩子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 现代翻译理论、翻译与武装冲突等。电子邮箱: zimanhan@sina.com